

集体读报：中央苏区农民群众 政治认同的内在逻辑与呈现方式

李 丹¹，周宇豪²，张 睿³

(1. 2. 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上海 200040；

3. 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陕西西安 710062)

摘 要：由于中央苏区农民群众知识水平的局限性，中国共产党以组织集体读报的方式开辟政治传播渠道。“读报”是一场身体性事件，其意识形态在社会符码的层面对身体产生建构，通过身体媒介将政治与农民群众意识关联起来，从而使其产生政治认同。开展组织化、多样化的集体读报活动，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和政治意识，对革命产生了积极影响，由此实现农民与政治之间互动及互助的现实图景。

关键词：中央苏区；集体读报；政治认同；文化水平

中图分类号：G21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418 (2022) 01-0085-10

中央苏区时期社会结构发生了转型，成为中国共产党革命根据地建设和农村社会改造的重要阶段。在此阶段中，政治动员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宣传革命的主要工作。大革命的失败导致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战略目标从城市转移到农村，为了壮大自身力量完成抗战与革命的任务，必须深入农民群众中进行组织动员工作。农民群众的政治认同对革命政党的壮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共产党在反“围剿”斗争中取得胜利与农民的政治认同是分不开的。当时由于外部因素（革命根据地经济发展落后、交通不便利、报纸发行量不足等）与内部因素（群众文化程度低，斗争意识与政治认同感薄弱）等各种条件的制约，中国共产党在组织政治传播的过程中产生不同程度的阻碍，在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亟需得到农民群众对自身的政治认同，并奠定坚实的群众基础。张闻天曾提出：“我们的报纸是阶级斗争的有力武器。”^[1] 集体读报活动作为一种政治传播的具体形式出现，无疑是将政治概念通过读报活动向基层群众生活场域延伸，起到了政治动员、文化教育、促进劳动生产等积极作用，在构建党群关系的过程中，以一种喜闻乐见的方式塑造群众的政治认同。目前，学界对中央苏区宣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报刊的内容，对集体读报与读者的研究成果较少。本文以集体读报活动为研究对象，探讨中央苏区群众政治认同从无到有的过程。那么，为什么需要组织集体读报？社会转型期读报对群众政治认同产生了哪些影响？梳理读报背后的内在逻辑是分析中央苏区时期政治传播渠道的必要前提。

一、中央苏区集体读报的内在逻辑

在历史实践的过程中，中央苏区时期的革命现实和革命对象发生了转向，从而引发了阅读思维的蜕变。由于这种蜕变，在中央苏区社会中读报与农民群众的社会关系，被确立为一种规范性的实践方式，与其他宣传模式相对比，成为一种超历史的适用性，将集体读报与农民群众之间的互动以及追本溯源的历史性叙述，改造为一种共时性的政策策略。在革命现实和革命对象双重转向过程中，蕴含了

认知范围内主客观的和谐变奏。在此变革背景下,中国共产党逐渐形成了政治传播渠道早期的实践探索与思想建构,梳理社会变革背景下为何会产生集体读报的内在逻辑。

(一)“城市”到“农村”:革命现实的新转向

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道路发生了新的转向,报刊的重心也从城市转移到了农村,加速了中国共产党宣传路线“向下走”的进程。从“城市”到“农村”的地域转型过程中,其政治传播思维同以往发生了改变。报刊成为传播政治、拉近党群关系的重要媒介。19世纪末,俄国范围内接连爆发工人运动,列宁曾强调“要不断向群众灌输阶级斗争、社会主义、俄国无产阶级的政治任务思想”^[2]。如何使政治主张等内容在工人群众中进行普及?“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3]。简而言之,政治意识需要通过宣传灌输到群众中去,报刊是政治思想传播并联系群众的载体,是传播政治思想的重要媒介。但是,农民群众由于知识水平受限的因素,并不能完全理解报纸中所刊登的政治战略理念与革命导向。在这样的现实环境下,需要一种简单有效的宣传方式重塑群众心目中中国共产党的形象,进而促使农民群众力量加入到革命斗争中。“冬天到了,农村中闲暇的时间比较多,我们应该利用这些时期加强中央苏区人民中的政治文化教育工作,来提高群众的文化政治水平。”^[4]面对革命现实的转型,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的宣传内容中倾向于视野下沉,以农民群众为主要的传播对象,开展符合革命现实的宣传实践活动。

(二)亟需农民群众认清中国革命形势

1927年以后,国内政治局势逆转,中国共产党开辟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红军队伍不断扩大并建立各级红色政权,引起了国民党的政治恐慌,致使蒋介石在军阀混战时,调转枪口对红军和中央苏区进行“围剿”,捏造虚假的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负面形象。除了在军事上对中央苏区和红军进行打击外,国民党在经济上也施行严密的封锁。当时,国民党主要封锁中央苏区的军需用品和日用品,同时严格控制食盐、火油的购买数量,食盐“每人每天,只许购买三钱,五口之家,得购一两五钱”。对军需用品的封锁更加严苛,任何输入中央苏区的军需用品必须持有该地最高军政机关下发的通行证,否则不予输送。限制中央苏区的商品输出导致内部商品过剩,造成严重的亏损。除此之外,国民党对中央苏区还进行交通封锁,往来人员必须持有相关证件才允许通行,在中央苏区各县设置交通管理所,严格控制中央苏区对外的陆路交通。国民党的上述举措已严重影响中央苏区内部农民群众的正常生活。面对这样的生活环境,大多数中央苏区农民群众由于知识水平受限和政治思想模糊,仍然被蒙蔽其中。在面临严峻的考验之时,中国共产党仍需考虑如何扩大红军队伍。从农民的政治认同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的生存与发展,再到使农民认识中国革命形势是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如何正确引导群众认识中国革命形势,区分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本质差别?如何壮大中国共产党队伍应对来自内外部的革命斗争?面对现实问题,中国共产党认为需要通过开展广泛的宣传工作,改变农民群众落后的价值观念,使其认清目前中国革命形势,充分了解党的政策主张,不断激发他们的革命积极性,使其产生政治认同及具身性参与。

中央苏区中国共产党组织的集体读报活动成为革命宣传走向农民群众的重要宣传实践活动。中央苏区时期是从城市场域向农村场域的转型期,革命宣传对象从工人阶级转向农民阶级。这个阶段农民群众思想意识仍停留在旧式的思想理念,以往在城市针对工人阶层创办的大众传播刊物,面对知识文化有限以及思想理念受封建思想禁锢的农民群体,如何开展政治思想宣传实践活动?开展革命宣传实践必须进入农村,发挥农民群众力量,促进革命的深入与政治思想的渗透。以党的组织结构为基点,结合中央苏区的革命现实,充分发挥报刊的传播作用,将报刊作为有效的政治引导工具,与农民群众

紧密联系起来,为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的新闻宣传实践活动提供了新思路与新模式,以农民群众为对象的集体读报活动成为加强群众政治认同的重要途径。

(三) 阅读思维的蜕变

在我国的传统社会中,阅读属于精英阶层知识分子的文化体验,农民群众游离于精英阶层所建构的文化圈之外,在农村社会中出现“有语无文”的现象。中国的文字并不发生在农村,不是人民的,而是庙堂性的、官家的。^[5]不是任何人都有学习文字的机会。农村生产劳作没有闲暇的时间,有闲暇时间则无法进行劳作,闲暇和生产相互矛盾。简单而言,除非得到生产者的经济供给,否则是无法脱离生产劳作的。在传统的农村社会中,只有地主才能靠收取租金维持生活,他们拥有闲暇时间读书,于是读书人、知识分子就限制在这一个经济阶层中,而读书、阅读则成为一种“私领域”的范畴。但过去固化的思维模式和社会现象,随着中国共产党对于革命宣传思想的转型逐渐消解。在中央苏区时期阅读进入了“公共领域”,“报刊作为大众传媒的重要功能体现于民众是否能够公开阅读,对于一份报纸而言,能够进入群众的阅读世界,是检验报纸影响力和传播效果的关键因素”^[6]。中央苏区集体读报成为重塑农民群众思想观念和引导其政治行为的重要方式。

中央苏区时期党报党刊的使命主要体现在宣传政党纲领和路线,因此,除了提高传播内容的战斗性和针对性以外,还需对发行对象、有效阅读等方面开展创新性工作。深入农民群众并宣传党的政策,成为中国共产党开辟阅读空间并组织集体读报,使阅读向“公共领域”转型最重要的前提。中央苏区时期的公共阅读建构有效解决农民群众由于文化程度限制、生产劳作等不同原因,而导致无法独立阅读的困境。在呈现具体的信息之前,读报就已经在作者、读者和听众之间构建了一种公共性的团结感,公共阅读强调了集体性概念,摒弃旧有的读书环境场域,打造阅读公共空间。通过集体读报的方式推动群众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认知,将农民群众纳入中国共产党的宣传之网,使党报、党刊能够更好在群众中起到宣传作用。

二、集体读报对农民群众政治认同的形塑

中央苏区建立之前,赣南和闽西地区交通闭塞,导致信息不流通,农民生活和受教育条件都受到影响。在这样的环境下,广大农民群众凭借眼睛和耳朵这两个器官,足以应付生产和生活的需要。^[7]因此,人际的口头传播成为新闻宣传的重要方式。人们用身体来感知世界,将不可见的转化为可感觉的、可见的。把党的方针路线与政策导向借助集体读报活动外化于形,对农民群众的政治认同塑形以及思想意识变革产生关键作用。

(一) 身体在场的互相影响

在乡村社会政治发展中,一些学者认为,农村政治结构的变迁是在国家主导的前提下进行的乡村社会制度变迁,国家不会退出其主导的地位,在国家强大的控制力之下,社会自主性在推动农村政治发展力量是微乎其微。^[8]在农村政治生活方面,在作出制度调整决策的过程中社会力量的作用极小。在国家的主导下,“政治认同”理念逐步根植于农民群众思维。中央苏区时期,在“国家—社会”关系结构格局中,需具体到政治认同可行性的表现内容。一方面,强化农民群众对党革命政策的认同能力。党在制定政策时要建立在农民群众需求的基础上,当党形成决策时,他们才会参与其中并积极配合。另一方面,党与村庄的良性互动。两者间的良性互动有利于实现农民群众对主流政治意识形态与革命战略的认同能力。革命战争胜利从根本上取决于农民群众对政治意识形态认同之强弱。如果认同强,党组织在制定革命政策时受到的阻碍或者群众反对声音将会弱化。要追求政治主流意识形态与革命战

略的高度认同,宣传实践活动是一条行之有效的路径选择,加强农民群众在活动实践中获取政治知识和能力,使其形成政治意识和立场,实现农民群众与党之间的有效互动。集体读报活动通过身体媒介,建立起报纸与农民群众的直接联系,在读报的过程中将党的理论思想潜移默化地传达给农民群众,并归纳其反馈意见。读报活动在组织化力量的推动与农民群众反馈意见的收集过程中,完成了党与农民群众二者之间的有效互动。那么读报何以成为一种农民群众政治认同的仪式呢?

这种仪式主要体现在身体在场的互相影响。集体读报的人数范围在5至10人,共同聚集在同一场所,通过读报、听报、交流和漫谈对政治概念互相建构产生影响。纸质报刊通过“读—听”的场域互动变得更加立体化,政党形象经过印刷媒体转为口语化的过程完成了政治想象性在场,声音的具身性唤起同一空间内的受众更多的情感卷入。听者的注意力与目光聚焦在读报的声音和报刊上,尤其是读报中多人针对政治内容的讨论和交流,促进党组织和农民群众间的合意,二者在身体在场的面对面交流中,达成互动。

中央苏区时期的集体读报活动,展现出一种关于身与心、体与脑、思想与感情之间的独特理解方式,展现出以身体作为媒介的思想改造与政治认同建构的路径。“有声”的革命动员不仅是对听众的意识形态和思想认同进行建构,更致力于召唤一个集体的、感官的革命主题及其身体性共鸣。现象学家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把身体看作是生物介入确定环境、参与计划和继续置身其中的媒介物,^[9]也是意识以物体方式存在的中介。^{[9] (183)}身体作为中介在阅读的过程中,通过语言的传播让不同阶层的群众对政治建立了一种共同的想象,并对其进行政治认同塑形。在这个过程中,身体的技术性延伸使得感官系统重新获取认知平衡,生活在口语主导的听觉空间里,环境与群众产生了深度卷入的关系。报纸作为传播媒介改变了人类身体感官与周边环境之间的关系,同时改变了人类感官与政治认同的关系。报纸是一种以文字作为传播符号的大众媒介,而文字符号具有一定的抽象性。由于中央苏区的农民群众文化程度较低,各种各样的口头宣传形式对其更有效果。^[10]通过农村各级组织进行读报活动,将国家政策与事件第一时间传达给群众,提高报纸的传播效果,从而塑造农民群众的政治认同。在中央苏区时期,集体读报作为推动革命的身体媒介,将读报活动落实在各个环节中,凸显了组织化的特征。

(二) 建立农民群众的政治认同

自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社会关系的调整与农民政治认同的互动紧密相关。中央苏区时期,在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改革成为获取农民群众认同的首要举措,土地的获得使农民对中国共产党及政权的认同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曹树基用“蜜月”来形容土地改革时期党与农民的关系,中国共产党的视野从城市空间下沉到乡村社会,一改传统社会中国国家对农民的控制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而鞭长莫及的尴尬,旧时的国家政权、士绅或地主、农民的三角关系被新的政权与农民的双边关系取代了。这种双边关系成为一种政治上的双向互动,“政治认同”并非群众对党的单向认同,而是双向流动的结果。党内干部与军队内部对“群众话语”地位的认可成为农民群众政治认同塑形的必要前提。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重视农民群众对革命的意义,1929年12月在古田会议上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提到“红军打仗不单纯只是为了打仗,而是需要得到群众的支持,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11]。从某种视角来看,红军革命战斗的意义在于对过去农民群众心中政党印象的纠偏,建立党和红军在群众中的正面形象,其内在价值是对政治观念与革命意识的建构,最终目的是组织和鼓动农民参与革命斗争。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解决了农民个体利益长期被忽视的问题,缓解过去政党与农民之间日益激化的矛盾,从物质层面获得农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

信任。除此之外,在精神层面,中国共产党运用宣传手段以解构旧思想的方式,为群众重构了国家、政治与个人的关系。

“政治”是在什么样的知识视野和话语空间中对农民群众展开的?20世纪30年代初,中央苏区仍处于文化教育落后的地区,绝大多数农民群众不识字,看不懂传单标语,更别提读报。另外,中央苏区根据地长期遭受封锁,纸张和印刷供需、报纸的发行量以及覆盖面均受到影响。对于话语空间,不同于私人阅读体验,中央苏区的农民群众是通过各种途径,进入公共阅读空间,听他人读报。俱乐部、列宁室内设的阅报室成为建构中央苏区高使用率的公共阅读空间。俱乐部和列宁室是“党教育群众提高政治思想觉悟、文化水平以及扩大党在群众中政治影响力的重要工具之一”^[12]。中央苏区农村每个乡均设俱乐部和列宁室,并要求俱乐部内部布置图书室,凡是苏维埃公民必须要成为俱乐部的会员。^[13]据统计,1934年,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共有俱乐部1656个。^[14]图书室购置各种革命报刊,有识字能力的人争相传阅报纸。在俱乐部和列宁室的墙报栏贴有《红色中华》《青年实话》等报刊,不识字的农民群众听别人读报,从中学习革命基础知识和社会知识。^[15]在赣东北中央苏区的俱乐部内的阅报室放置各种革命读物,广大农民群众聚集在阅报室里唱革命歌、读革命诗、读报识字,其热烈场景前所未见。^[16]农村俱乐部既丰富了农民群众的精神世界,又使群众受到革命文化的教育熏陶,通过集体读报将“政治认同”与农民生活联系在一起,从而产生“政治”认同。俱乐部和列宁室以一种空间的形式成为中央苏区革命时期广泛使用的政治工具,既是意识形态的,也是知识性的。作为一种深入农民群众生活场域的组织,担负了中央苏区文化教育以及政治传播的任务。除了公共空间作为政治认同的工具以外,身体媒介同样充当了政治传播工具。在集体读报互动中,印刷媒介通过口语传播形成了另一种阅读实践活动。1932年,苏维埃政府颁布了《指导群众读报条例》,要求每个村组织读报会,由读报委员向群众读报,将报纸上记载的文字信息读给农民群众并详细解释。^[17]“听报纸上说国民党把中国一半土地卖给日本,让咱们农民彻底认清了国民党的卖国行径。”^[18]通过集体读报这一政治传播渠道,逐渐建立农民群众对“政治”的认知,这是一种从无到有的政治认同的过程,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动员夯实了群众基础。

(三) 农民群众思想意识变革

中国共产党通过集体读报的阅读活动实践,将“政治”的概念与农民群众生活场域建立联系,不自觉地形成了一种“政治”的想象共同体,民族利益的理念就成为革命动员背后无私的光环,将政治化的意识与为革命献身的使命感自然而然地联系在一起。为革命献身的使命感这样的理念,是经由宿命的媒介与纯粹的理念一同孕育的。苏维埃革命对于共产主义者来说,是一种主动选择与行动;但对于广大民众,尤其是农村的民众来说,是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和认识的。^[19]起初许多群众都不知道什么是苏联,是一间店子,一个人名,或者是苏维埃区域的大联合呢?^[10]由此可见,广大农民群众对政治概念的薄弱程度。“谁都知道,国民党统治下一切文化教育机关都在地主资产阶级手里,他们的教育政策是武断的反动宣言,将农民群众排除在教育之外。”文化闭塞导致农民群众愚昧无知,全国文盲率占全人口80%以上,对于革命文化思想则采取极端残酷的白色恐怖。^[20]革命阵地从城市转向农村,首先需要使农民撇清国民党对红军形象造成的负面影响,在民众心中建立真实形象,从而争取更多的革命力量。但中央苏区民众在面对前所未有的苏维埃革命时呈现出不同态度,有革命意志坚定者、为减少损失和保存力量的暂时妥协者、反水逃亡甚至反抗革命者。^{[19](297)}在此形势下,加强对农民的宣传动员,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路线转变后迫切需要采取的行动。“保守、对政治的冷漠是中国农民的传统心态。”^[21]面对识字率较低的农民开展新闻宣传,集体读报行为本身就意味着传统阅读主体的变革,即由

城市工人阶级与知识分子阶级转变为知识基础薄弱的农民群众。在这样的群体中开展相关集体读报活动实践,是对已有思想认知的挑战,同时也是中国近现代革命中中国共产党人的智慧体现。

农民群众思想的变革主要表现在政治认知范围的更新,以及对革命概念的重新认知。苏维埃政府运用一切方法提高农民群众政治文化水平,根据江西、福建、广东三省统计,在二千九百三十二个乡中,有列宁小学三千零五十二所,学生八万九千一百七十人,识字组三万两千三百八十八组,组员十五万五千三百七十八人,俱乐部一千五百六十六个。^[20] 这些数据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极为重视农民群众的文化教育工作,文化程度是提高政治认同的前提。中国共产党在组织集体读报实践活动过程中,农民群众潜移默化地逐步接纳新的思想观念与“政治认同”,从而产生思想的变革。如1931年5月,庄东晓在致中央妇委的信中提到:“自苏维埃成立后……十一岁的女子都知‘封建’两字是骂人的表示。”^[22] 方志敏曾提到:“开始,苏维埃三个字很多人不懂,而现在,连儿童都知道苏维埃政府是属于人民大众的政府。”^[23] 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为农民群众开展集体读报活动,使之在革命和政治认知加深的过程中重塑自我,摒弃旧式错误的思想观念,将政治、个人与国家三者的关系在个人的观念体系中产生勾连。

三、农民群众集体读报政治认同的两种呈现方式

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论与政治方向如何深入农民群众,使之入脑入心并吸纳更多的革命力量,物质与精神两层面的困难始终是中央苏区时期新闻宣传面临的重要问题。物质层面上,中央苏区根据地面临国民党的反复“围剿”,恶劣环境和物资缺乏成为新闻宣传的不利因素。精神层面上,农民群众的思想仍然禁锢在传统社会封建桎梏之中,文化程度低下更是阻碍党组织政策传播到达率的主要影响因素。列宁提出:“文盲是处在政治之外的,必须先教他们识字,不识字就不可能有政治,不识字只能有流言蜚语、谎话偏见,而没有政治。”集体读报的两种实践方式是以二级传播为基础,搭建党群政治互动过程中的媒介选择。

(一) 读报的具体实施方式

在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探索了以各种方式将报刊口语化、通俗化,使其在农民群众中有效传播,而读报活动则是其中一种模式,成为实现报纸宣传效果最大化以及报纸和民众双向联动的媒介。“在我们的队伍当中,宣传家和煽动家并不少于组织家,但目前宣传家的作用还没有完全调动起来,我们需要运用最通俗的言语把我们所处的地位、战争形势告知群众。”^[24] “普遍建立青年工人群众的附属组织,比如读报班。”^[25] 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中国共产党亟需将政治思想下沉至民众,各式各样的读报形式成为民众阅读报刊的新方式。“由于中央苏区根据地青年农民群体文化水平不高,必须要发展读报运动。在每个列宁室里组织读报组。”读报组的作用是为一般民众解决由于知识水平受限,而无法直接阅读与理解报刊的问题。在青年群众当中,“只要《青年实话》送到,立即召集大家组织读报会,阅读、解答与讨论报刊中的一些重要文章。”^[26] 通过对报刊内容的解读,将党的方针政策、战略目标深入到群众的思想意识。听报使听众与报刊交融在一起,增加主体性之间的联系。口头的文化造成参与者在精神上的连接,声音唤起更多的情感与信仰。^[27] 此类阅读模式将报刊阅读这种私人媒介消费行为转化为集体式的阅读。在集体读报中“以点对面”的大众传播实质虽未改变,但加入“意见领袖式”的二级传播因素,使读报的行为模式和内容议题更加具有规范性与引导性。

1930年3月,党的机关刊物《红旗》发表的文章《提高我们党报的作用》中指出:“党报是革命形势中重要的斗争工具。”^[28] 党报作为传播媒介是动员农民群众支持政治主张的主要方式,集体读报作

为中央苏区农民群众主要阅读方式的实践活动,是实现党报价值的外化形式。集体读报活动除了担负宣传党报功能的作用之外,在阅读空间和内容上同样具有组织性和系统性。据统计,1932年底,江西省14个县共建立712个乡村俱乐部和列宁室。根据要求,列宁室需供应书报以便群众阅读,文化委员会则要求俱乐部要定时开展各种文体活动,包括读报和墙报,组织群众每周读报一次^[29]。俱乐部组织讲报队“用讲故事的方式讲给学生听,再挑出优秀分子组成六个讲报队,拿着报纸到处宣讲”^[30]。俱乐部的组织纲要中写道,读报组应将农民群众聚集到具体地点,最好选择在俱乐部的图书室进行读报,并将报纸上的政策内容逐字逐句为群众解释。^[31]在固定的阅报场所以秩序性的阅读方式开展报刊传播,更加凸显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读报活动的组织性和秩序性,同时使报刊的组织性传播转变为一种农民群众的“政治想象”共同体。除乡村俱乐部和列宁室以外,1932年,赣东北中央苏区恢复成立了读报会,制定了相关读报条例“为了加强中央苏区内农民群众的政治教育,提高大家的政治水平,将中央苏区内各种报纸(红旗、红色中华等),所刊载的文章传播到广大农民群众中去,为了让大家了解政治,组织读报会是主要途径之一”^{[29](165)}。1933年4月,兴国县高圩黄岑乡的报告中指出:“村民经常自己出钱买报读,一般选在圩日,大家喜欢读《红色中华》《红星》等革命报刊,把党的政策撒播在群众心里。”^[32]读报无形中提高了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另外,村民根据各自的时间安排自主选择读报时间,中央苏区的机关、工厂和农村的读报组有的是在劳动时休息时间读报,有的则利用晚上时间集体读报。大家了解政治时事,增强了革命信心。^[33]中央劳动部红军家属夜校办的读报课,隔两天轮流一次,他们最喜欢听前线的打仗消息,其中有学员谈到“一个月前我还是个睁眼瞎,通过读报组的帮助现在已经认识一半的字了”^[34]。中央苏区时期的读报活动不同于以往知识分子阶级的阅读经验,这样的活动是一种分散化、下沉式、自上而下的组织形式,通过声音传播的方式,感悟党的政治理念与革命形势,并生成不同的读法与意义。

(二) 墙报的实践探索

墙报是一种“舶来品”,始创于俄国十月革命期间。当时苏联重视墙报的传播作用,认为“它是党组织受众一支重要的武器,可以利用其进行日常的群众组织和教育工作”^[35]。中国共产党历来十分重视墙报工作,将其作为一种充分发挥农民群众力量并达到宣传目的的传播媒介,同时也是文艺大众化的重要方式。虽然中国共产党对墙报工作的实践过程较长,但更多停留在理论探索层面,真正使墙报工作从理论走向实际并形成一套规范的制度体系,是在中央苏区。

1929年8月,中央福建省委在闽西特委的宣传工作中提出,要使闽西群众对土地改革的政策足够了解,就要认真办好墙报。^{[26](13)}阅读是农民群众直接的斗争工具,因此,墙报成为农民教育的重要工作之一。相较于传统的报刊阅读效果而言,墙报具有的接近性更能深入群众,拉近心理和空间上的距离。通讯社充分发挥群众的力量,经常发动群众投稿,收集墙报稿子并向上级报告消息,^{[26](99-100)}墙报的阅读方式直接让农民参与到新闻创作中,既是受者也是传者,改变传统阅读的单向接受的局面,有效弥合了新闻宣传力量与农民群众间的缝隙。墙报上贴着简洁精悍的布告,例如“来团结,来革命;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土豪劣绅;统一中华,举国称庆”^[36]等标语,言简意赅地指出了中国共产党革命的核心目标和任务,增强农民群众对政治认同的感知。墙报不是列宁室的装饰品,应该是反映墙报所在地的农民群众的实际生活,是鼓动群众的武器,是提高农民群众文化程度的工具。^[37]

《俱乐部的组织和工作纲要》关于文化教育部分中指出“墙报应当反映政治问题,尤其是关于地方政治情形,必须要吸纳更多群众投稿”^{[26](106)}。中央苏区根据地的墙报传播除了运用通俗易懂的文字以外,更多内容是关于政治问题。另外,由于墙报阅读在介质与公共空间上的传播性质,使墙报对群众

的日常生活具有自我纠偏功能,加强了报刊在农民群众日常生活场域中的公共舆论力量。农民阅读墙报不仅是信息的单向接受,更多地接受着同一信息场域中的空间舆论规制,使其以往习惯强调时间上的生活感知与信息归集,转向具有距离感的空间偏向,带给农民群众生活与思想观念的变迁。

集体读报通过公共阅读的方式,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中央苏区根据地农民群众文化程度不高的现实困境。在组织化的读报活动中,通过深入农民群众的阅读方式将“政治认同”嵌入其中,从而实现与农民群众革命思想的同频共振。一言以蔽之,无论是读报,还是墙报的阅读方式,都是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深入群众生活场域的体现,为我国新闻事业后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四、集体读报对群众政治认同产生的影响

中央苏区的宣传服务于政治工作,宣传工作始终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相联系。在中央苏区组织的集体读报,以农民群众乐于接受的形式得到广泛支持,党的宣传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央苏区的传播,使党和苏维埃政府形象深入人心,奠定了中央苏区时期革命胜利的群众基础,为以后的新闻宣传工作积累了经验。

(一) 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大众化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党在中央苏区开展宣传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通过有计划、有组织的集体读报方式向群众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教育,有效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央苏区群众中的传播。中央苏区时期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就像当时文艺大众化、普遍化、深入群众一样,虽不高深却为大众所有。^[38]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是通过宣传方式走向大众化的过程,两者相辅相成。

一方面,通过集体读报的形式宣传马克思主义,破除农民群众意识中封建旧思想的桎梏。中央苏区创建之前,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发展滞后,加之中央苏区内农民群众的宗族姓氏观念浓厚,限制人们的思想意识和言论自由,对新思想和新知识缺乏认知能力。因此,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政治也知之甚少。党和苏维埃政府考虑到农民群众的文化程度,出版了各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通俗读物,例如《工农专政》《列宁主义问题》等,借助集体读报的传播形式,帮助群众深入认同马克思主义,帮助农民群众脱离愚昧,从而提高文化水平。

另一方面,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加强农民群众的政治认同。毛泽东提出,用马克思理论武装农民群众的头脑,从而提高整体文化水平。列宁室和列宁学校相继推出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工人运动、党史等课程。除了设立课程以外,党和苏维埃政府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在列宁室和俱乐部进行宣读。在中国共产党的宣传下,农民群众在接受教育的同时,也通过报纸和读物了解无产阶级专政等相关知识,政治觉悟不断提高。

(二) 扩大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力

中国共产党初入中央苏区时,由于群众受到国民党的舆论迷惑,“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标签在他们的思想意识中呈现负面效应。中国共产党通过集体读报的口头宣传形式,向群众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代表农民群众力量,全心全意为劳苦群众谋利益的政党,使群众正确认识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集体读报作用在于使农民群众内心对中国共产党形象进行重构,进一步消除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防备心理,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由原来的陌生和恐惧转变为支持和拥护。在中央苏区,全体群众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不识字的农民也能够分辨出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区别。赣西南特委的刘士奇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到:“群众自动张贴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标语,党的威信在群众中不断提高。”^[39]

另外,集体读报塑造了党和苏维埃良好的政府形象。在党到达中央苏区之前,中央苏区的农民群众受封建主义压迫,导致对政治产生严重漠视。中国共产党初入中央苏区时,就有群众指出:“从前国民党宣传的何等漂亮,而现在得到政权后我们的益处又在哪里?”^{[39](137)} 报纸作为宣传载体,让群众知道国共两党的差别——中国共产党能与群众同生死、共存亡。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曾写道,毛泽东和其他战士一样,毫不起眼地坐在群众中间,^[40] 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始终与农民群众同舟共济。

(三) 奠定了“反围剿”战争的群众基础

农民群众政治意识的提高与集体读报是分不开的,运用读报对其进行政治意识形塑,让农民群众自觉拥护党的政策和工作,从而实现组织群众和武装群众的目标。基于此,红军才能接连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同时证明集体读报的宣传手段奠定了中央苏区反“围剿”的群众基础,主要表现在:

一是农民群众积极参军。在集体读报活动的宣传引导下,得知中国共产党使群众既维护自身利益,又获得政治权利。为此,农民纷纷加入军队,掀起了中央苏区内的参军高潮。当时,“中央苏区出现了许多父送子、妻送郎参军上前线的感人事迹。”^[41] 中央苏区农民群众将对中国共产党的热爱化为参军的实际行动,自觉为保卫苏维埃政权而奋战。

二是为支援前线做好后勤保障。在战争期间,红军面临的重要问题就是物资短缺。在党的号召下,为了保证前线战士军需品充足,群众自觉筹粮筹款给予支援。报纸记载道,一个群众把茶壶给政府说:“把茶壶熔掉制成子弹打碎白匪的脑壳!”^{[41](453)} 许多农民群众参加医疗队等支前组织,战争后方支援队也得到了农民群众的支持,妇女和儿童搬运粮食、帮忙探路等。^[42] 农民群众既支持了前线作战,又做好了后勤保障。在中央苏区群众的大力支持下,党和红军打败了国民党军队四次大规模“围剿”,坚定了广大军民革命的决心。

五、结 语

中央苏区的集体读报实践活动,既折射了党对农民群众生活场域的改造,^{[14](112)} 也成为政治影响力深入农村社会,引导群众产生政治认同的重要方式。集体读报是一种高度完备的组织化力量,是对党报作为组织者这一观念的延伸体现。在政治认同与阅读实践的互动过程中,集体读报成为一种党群互动意识的工具。以宣传政治思想为目的,以强有力的组织领导力,将政治概念通过读报形式,传播到心理上仍处于“抵触”状态的农民群众。

通过一次次的党群互动与参与,群众在集体读报中构建“政治革命”的想象存在,使其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从无到有”的政治认同,并自愿纳入到革命战争当中。集体读报作为中央苏区群众政治认同的身体媒介,是传播党和苏维埃政府信息的重要载体,将群众纳入中国共产党的宣传体系之中,有效发挥了政治动员的作用。

参考文献:

- [1] 洛甫. 关于我们的报纸 [N]. 斗争, 1933-12-1 (1).
- [2] 列宁全集(第二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9: 284.
- [3] 列宁全集(第六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3: 29.
- [4] 加紧教育工作提高苏区群众的文化政治水平 [N]. 红色中华, 1936-12-13 (3).
- [5] 费孝通, 吴晗. 皇权与乡绅 [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13.
- [6] 蒋建国. 办报与读报: 晚清报刊大众化的探索与困惑 [J]. 新闻大学, 2016 (2): 29-37.

- [7] 张品良. 传播学视域下的中央苏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6: 364.
- [8] 于建嵘. 民主制度与中国乡土社会—转型期中国农村政治结构变迁的实证性评价 [J]. 中国农村研究, 2001: 295-345.
- [9] [法] 莫里斯·梅洛-庞蒂. 知觉现象学 [M]. 姜志辉,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1: 116.
- [10] 尚昆. 转变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 [N]. 斗争, 1933-2-4 (5).
- [11] 古田会议纪念馆. 古田会议文献资料 [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7: 370.
- [12] 江西省文化厅革命文化史料征集工作委员会, 福建省文化厅革命文化史料征集工作委员会. 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 [M].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4: 54.
- [13] 张挚, 张玉龙. 中央苏区教育史料汇编 (上册) [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126-127.
- [14] 林绪武, 管西荣. 苏区的公共阅读建构——以《红色中华》的大众阅读为例 [J]. 人文杂志, 2021 (2): 103-112.
- [15]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 院校·回忆史料 [M].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1995: 28.
- [16]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横峰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横峰文史第 1 辑 [M]. 北京: 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5: 137.
- [17] 赣南师范学院, 江西省教育科学研究所. 江西苏区教育资料汇编 (六) [M]. 南昌: 江西省教育科学研究所, 1985: 84.
- [18] 识字班全体师生. 第一补充师全体战士们 [N]. 红色中华, 1934-7-28 (4).
- [19] 何友良. 苏区制度、社会和民众研究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287.
- [20] 现在要说到苏维埃的文化教育了 [N]. 红色中华, 1934-1-26 (4).
- [21] 张昭国. 试析中央苏区群众运动模式的运作 [J]. 武汉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8 (1): 83-86.
- [22] 中央档案馆. 湘鄂西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1931-1934 [M]. 武汉: 湖北省档案馆, 1986: 13.
- [23] 江西省档案馆. 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 (下册) [M].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7: 520.
- [24] 然之. 把动员中的宣传鼓动工作实际的加强起来 [N]. 红色中华, 1934-5-18 (1).
- [25] 青年工人的组织问题 [N]. 红色中华, 1930-9-17 (3).
- [26] 《中央苏区文艺丛书》编委会. 中央苏区文艺史料集 [M].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7: 236.
- [27] 周叶飞, 詹佳如. 缺席的耳朵: 报纸阅读阐释的声音逻辑 [J]. 上海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1 (5): 131-140.
- [28]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 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 (下) [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80: 36.
- [29] 程云. 江西苏区新闻史 [M].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4: 163.
- [30] 张挚, 张玉龙. 中央苏区教育史料汇编 (下册) [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624.
- [31] 张睿. “群众办报”: 思想史与阅读实践中的理论建构 [D]. 西安: 西北大学, 2021.
- [32] 邱文生, 黄元铭, 黄春开. 将军与故土 [M]. 厦门: 鹭江出版社, 2014: 86.
- [33] 顾明远, 刘复兴. 从新民主主义教育到社会主义教育 (1921—2012) [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5: 80.
- [34] 介绍中央劳动部的红属夜校 [N]. 红色中华, 1934-7-21 (4).
- [35] [苏] 高列里克. 鼓动员与墙报 [M]. 陈冬序, 译. 沈阳: 东北人民出版社, 1954: 1.
- [36] 戈丽. 宣传方法介绍 [N]. 红色中华, 1934-9-30 (4).
- [37] 年. 怎样做墙报工作 [N]. 斗争, 1933-11-5 (4).
- [38] 高媛. 中国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研究 [D].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 2020.
- [39] 江西档案馆.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 (上册) [M].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2: 342.
- [40] [美] 埃德加·斯诺. 西行漫记 [M]. 北京: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2: 57-58.
- [41] 严帆. 中央苏区新闻出版印刷发行史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441.
- [4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1921~1949) (第十四册)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705.